



昨夜星辰 昨夜



——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的精神旅途

杨守森等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昨夜星辰 昨夜

——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的精神旅途

杨守森等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昨夜星辰昨夜风: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的精神旅途/杨守森等著. -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11
ISBN 7-215-05222-2

I. 昨… II. 杨… III. 当代文学-文学创作-中国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08110 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450002 电话:5723341)

新华书店经销 郑州市毛庄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A5 印张 11.875

字数 286 千字 印数 1-4 000 册

2003 年 1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1.00 元



序 / 杨守森

在人类的心灵深处，隐藏着层叠的历史。

诗人、作家，有着较常人更为敏感的心灵，在这些心灵中，也就存储着更多人类生活的秘密。这些秘密，不只关乎文学，更关乎民族强盛、历史进步、人性追求乃至整个人类的命运。其中蕴含的价值，等待着人们去开掘、去探索。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坛进入了一个诸多秘密大暴露的时期。由于一些当事人的陆续过世，由于若干政治禁忌的不断破除，由于人们思想观念的日渐开放，许多私人性质的日记、书信频见出版了，许多敢说真话的回忆录、访谈录问世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人生世相，坦陈在世人面前了。

人的心灵是复杂的，每个人的心灵都是一个难以言喻的世界。人的心灵又是顽强的，不论外在的力量多么强大，都不可能真正彻底地征服这个世界，于是，才有了厚重的人类历史，才有了历史的难以穷尽性。

诗人、作家的心灵尤为复杂，这些复杂的心灵，本身就是一笔宝贵的历史财富。对其进一步加强探索与解析，不仅有助于文学研究空间的拓展，也有助于我们更为深入地把握人类文学活动的奥妙与



规律。更为重要的是,可以使我们看清历史究竟,了悟生命意蕴,完善自我人格,找到人生坐标,能够勇敢地承担应由我们个人承担的那部分历史责任,能够为我们的民族乃至整个人类文明的进步,尽上个人应尽的义务。但愿我们这本研究部分作家的精神旅途的小书,对此能够小有裨益。



目 录

郭沫若：文坛泰斗与国务活动家 / 1

- 一、时代的喇叭 / 2
- 二、想做一个中学教员 / 7
- 三、身不由己 / 11
- 四、“十个手指伸开按跳蚤” / 16

茅 盾：小说大师与文化部部长 / 22

- 一、谨言慎行 / 23
- 二、矛盾的茅盾 / 27
- 三、内心深处的阴影 / 32
- 四、“文艺战线上掉队的老兵” / 38

周 扬：政治人格与文化人格 / 42

- 一、“可以开玩笑的朋友也没有” / 42
- 二、另一副面孔 / 47
- 三、在夹缝中生存 / 51



- 四、受害者与忏悔者 / 56
- 五、无法挣脱的悲剧人生 / 58

巴 金：原罪的重压与救赎 / 61

- 一、对创作个性的呼吁 / 62
- 二、“我还是不能原谅自己” / 66
- 三、炼狱中的圣火 / 69
- 四、个体性的救赎 / 72

老 舍：走向太平湖的人民艺术家 / 76

- 一、从旁观者到“歌德派” / 77
- 二、进退两难的“民主剧本” / 81
- 三、旗人情结与怀旧心理 / 85
- 四、太平湖：最后的归宿 / 90

周作人：风雨八道湾 / 95

- 一、新政权下的文化汉奸 / 96
- 二、偶露狰狞的“流氓鬼” / 100
- 三、苦雨丝丝入梦凉 / 104

张恨水：风光不再的言情大师 / 110

- 一、“提前死亡”的困境 / 111
- 二、不喜欢吃藤生植物 / 114
- 三、不幸的“过渡人物” / 116

沈从文：倔强的“水”性智者 / 121

- 一、逃避与面对 / 121
- 二、放弃与坚守 / 126



三、隐退与进取 / 129

曹 禺：复杂的“透明” / 134

一、“坐上了神仙的飞机” / 135

二、精神孤儿与本色作家 / 140

三、这个世界实在不高明 / 143

冰 心：春水深处的波澜 / 148

一、脱胎换骨与话语迁徙 / 148

二、爱的哲学与宇宙情怀 / 153

三、大海上的灯塔守护者 / 158

胡 风：生命扩张的苦难历程 / 162

一、“时间开始了” / 163

二、阶下囚 / 168

三、虽九死其犹未悔 / 174

四、糊涂的自信与痴想 / 178

丁 玲：昨夜西风凋碧树 / 181

一、复出之后 / 182

二、“那是死了的丁玲” / 185

三、“‘五四’的女儿” / 190

艾 蕻：养花人之梦 / 195

一、意气风发的军代表 / 196

二、声音喑哑了的芦笛 / 198

三、遗失在角落的核桃 / 203

四、浪尖上的电闪雷鸣 / 207



何其芳：学书学剑两无成 / 213

- 一、无奈的诗人 / 214
- 二、尴尬的剑客 / 219
- 三、旋转的齿轮 / 222

刘白羽：用信仰之火燃烧自己 / 226

- 一、骨子里的军人气质 / 226
- 二、“战斗者” / 230
- 三、“罪责感” / 233

赵树理：恂恂如农村老夫子 / 236

- 一、一条离开河流的鱼 / 237
- 二、积极主动地“赶任务” / 241
- 三、认死理的“土作家” / 245
- 四、民粹眼光的局限 / 248

孙 犁：清音入杳冥 / 251

- 一、病在心患赤子情 / 252
- 二、文章可泯道义存 / 255
- 三、乐则行之忧违之 / 260
- 四、大隐于市寂无声 / 264

无名氏：月夜观看玉兰舒卷 / 267

- 一、15号大院的神秘房客 / 268
- 二、星球哲学与星球信仰 / 272
- 三、开花在星云以外 / 276
- 四、拭去历史的尘埃 / 279



贺敬之：几回回梦里回延安 / 282

- 一、“思想性”的探求 / 282
- 二、“我们是太阳的孩子” / 287
- 三、“我已经拯救了自己的灵魂” / 290

郭小川：充满个性色彩的介入 / 294

- 一、刚勇无畏的战士人格 / 295
- 二、渴望掌握自己的命运 / 299
- 三、同情“右派”的“左派” / 303
- 四、陷入绝望的诗歌精灵 / 307

汪曾祺：晚霞何事别样红 / 312

- 一、率性任情 / 313
- 二、“御用文人” / 318
- 三、老树新花二度春 / 322

刘绍棠：运河滩上的朦胧夜色 / 325

- 一、全国闻名的“神童作家” / 326
- 二、“荃不察余之哀情” / 328
- 三、被放逐到乐园里 / 330
- 四、无怨无悔 / 332

浩然：在历史的风浪中颠簸 / 337

- 一、感恩戴德的农民作家 / 338
- 二、惶恐不安的风云人物 / 342
- 三、光环落尽的专案对象 / 345
- 四、自足自慰的文化心态 / 348



王 蒙：“少共”情结与“海的悲哀” / 354

- 一、童年时代的噩梦 / 354
- 二、灿烂的“少共”情结 / 357
- 三、隐含机锋的幽默 / 359
- 四、水似的大道无术 / 362
- 五、人情练达的中庸 / 365
- 六、两难选择的悲哀 / 367

后记 / 371



郭沫若：

文坛泰斗与国务活动家

在许多人心目中，郭沫若称得上是新中国的文坛泰斗、桂冠诗人，连最高领袖毛泽东都与他称兄道弟，并曾多次请其修改自己的诗词。在政治方面，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也走向了人生的巅峰：曾先后担任政务院副总理、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第一至第五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第九至第十一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全国文联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等重要职务。他去世后，党也给予了崇高的评价，称他是“继鲁迅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①。位高名重的郭沫若，本应是志得意满，不胜荣幸之至了，但实际上，在荣耀的外表下，忧伤与痛苦竟也不时涌动于心：他虽身兼数职，却又自知自己扮演的不过是迎来送往的“接客先生”的角色，顿感失意；他虽官居高位，却无力保护命在旦夕的儿子；他虽新作迭出，却自叹有不少乃逢场作戏。这是历史的悲哀、时代的悲哀，也不无他本人自我迷失的悲哀。

^① 邓小平：《沉痛悼念郭沫若同志——在郭沫若同志追悼会上的悼词》，《人民日报》1978年6月19日。



一、时代的喇叭

对于新中国的诞生,郭沫若无疑是充满了向往与喜悦之情的。1948年11月23日,在由香港赴东北解放区的海轮上,他曾赋诗抒怀:“天马行空良可拟,踏破惊涛万里程。自庆新生弥十日,北来真个见光明。”(《船泊石城畔杂感》)1949年2月,在由沈阳抵北平的途中他又写下了《抵北平感怀》:“多少人民血,换来此矜荣。思之泪欲堕,欢笑不成声。”诗句中饱含着他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他还在其他有关文章中多次强调时代之于人的重要性,表示要紧紧跟踪着时代走,不要落在时代的后面,要紧抓着时代精神。

作为一名诗人,他首先想到的是用诗行记录下新时代前进的脚步。假如把他新中国成立后的诗作按纪年的方式予以编排,就会发现,从1949年到1978年的30年间新中国所发生的大事几乎都被囊括其中了。开国大典之日,他的《新华颂》出现在《人民日报》上,之后有《突飞猛进一周年》、《庆祝建国十周年》、《十年建国增徽识》、《沁园春·一九六九年》、《歌颂“九大”路线》、《歌颂十届三中全会》……单看诗题便不难得出结论:他的诗是新中国的“诗史”。在这部“诗史”中,最为耀眼的色调是歌颂:《国庆颂》、《颂上海》、《颂武汉》、《颂三节》、《颂一穷》、《颂二白》、《颂公社》、《颂钢铁》……这样一种颂体写作,确实是郭沫若早就有意为之的。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就表示,“我要承认,我在前曾经保持过一个生活的原则,便是遇必要时保持沉默,遇必要时‘有所不为’”,“不要做扬雄”。“但到了今天,我却深切地感觉着,那样的生活原则是太消极了,太自私,太小资产阶级的了。我不能光是‘不要做’,而是应该‘要做’。譬如就是做歌功颂德的扬雄吧,我假如做人民群众的扬雄,又有什么不可?我是应该歌人民群众的功,颂人民群众的德的。人民群众才是我们



至高无上的宙司大神，我们之得以维持一线的生存而直到今天，实在是他的恩惠。”“万般皆下品，唯有人民高”，他为自己确立的目标就是要“尽可能做一部人民的打字机”^①。



▲ 1949年2月，毛泽东与郭沫若（右一）、茅盾（右二）、周扬（左二）合影

歌颂人民，当然更应歌颂人民领袖。于是，我们看到，歌颂毛泽东，成为郭沫若颂歌中的主体内容。在发表于开国之日的《新华颂》中，郭沫若便写下了“光明磊落，领袖雍容”之句。1958年1月，他在《题毛主席在飞机中工作的摄影》一诗中，则径直将毛泽东比作人间的“太阳”。这比喻自然不是郭沫若的独创，但出自于这样一位文坛泰斗之手，意义毕竟还是大不一样的。郭沫若对毛泽东的崇拜，自有其可以理解的道理。1926年，在革命策源地广州，两人有过长达4个月的交往，已颇有些心心相通。1938年，中共中央做出决定，以郭

^①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2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21页、255页、258页。



沫若为鲁迅的继承者、中国革命文化界的领袖，郭沫若清楚，毛泽东肯定是这一重要决定的主要决策者之一。1939年7月，郭父去世，毛泽东致挽联，自称“世侄”，赞郭沫若为“文坛宗匠”。1944年，郭的《甲申三百年祭》传到延安，毛泽东写信给予高度评价，并表示了羡慕之情。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时，两人的友情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在特殊的形势下，毛泽东安排了对郭沫若的专程访问；郭沫若则把自己的手表赠与领袖，据说这块手表一直伴随着毛泽东走到人生的终点；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在重庆文化界引起轩然大波，有人大做文章说其中有“帝王思想”，郭沫若则和诗两首，并专做《摩登唐吉珂德的一种手法》予以全力辩护。直至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仍称比自己一岁的郭沫若为“沫若兄”或“郭老”；郭沫若则称毛泽东为“毛公”或“主席”。两人时有促膝长谈，或鸿雁传书。人民领袖与文坛巨匠，一个羡慕对方的文化成就，一个赞扬对方的伟大业绩，颇有惺惺相惜、肝胆相照之感。以此为基点审视郭沫若对领袖的赞颂，尚是无可厚非的。遗憾的是，饱读史书，聪慧过人的郭沫若，对毛泽东的赞颂，后来竟发展到盲目崇拜的程度。毛泽东《清平乐·蒋桂战争》一词的手稿中，将“黄梁”写作“黄粱”，“龙岩”则多写了一个“龙”字，“分田分地真忙”下面没有句号。这本是可以理解的笔误或疏忽，而在1965年2月，郭沫若发表于《光明日报》的一篇诠释文章中，却将这类失误辩解为“无心的”“简化”，是“随意挥洒的证据”，并宣称“主席并无心成为诗家或词家，但他的诗词却成了诗词的顶峰。主席更无心成为书家，但他的墨迹却成了书法的顶峰”。毛泽东的诗词及书法成就的确非同一般，但以“顶峰”论之，就给人盲目崇拜之感了。显然，同样是由于对毛泽东的盲目崇拜，在1967年6月5日举行的一次亚非作家常设局会议上，他曾当众朗诵赞扬江青的诗：“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奋不顾身地在文艺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我们要使世界舞台也充满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尽管，他曾有过如此的自我解释：“我坦白地说，我是敬仰毛泽东同志的。我这不是盲目的个人崇拜，我是同样反对盲目崇拜的人。所谓盲目的个人崇拜是所崇拜的对象并不是真正代表真理的人。如果是真正代表真理的领袖，如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我们为什么不拜为老师？”^①但在后人心目中，仍不能不怀疑这位文坛泰斗另有用意。

除了歌颂时代、领袖之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郭沫若也总是尽力紧跟。1950年，他积极参与了批判电影《武训传》；在批胡风运动中，他相继发表了《反社会主义的胡风纲领》、《严厉镇压胡风反革命集团》等文章，并在胡风被捕之前，代表700名文化界人士吁请政府依法处理胡风。郭沫若这种冲锋陷阵的姿态，恰与茅盾形成鲜明对照。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政治浪潮中，茅盾总是设法保持低调，有时甚至为了躲避大会发言和写批判文章而称病不出。郭沫若却似乎一直处于亢奋状态，他每每用他那特有的充满激情的诗一样的言语来表达自己对时事的态度。他曾把自己1949年至1958年的报告、讲话、论文收编为《雄鸡集》，以为时代报晓之“雄鸡”自况，并明确宣称甘愿充当时代的“喇叭”。这让人想起30年代沈从文在《论郭沫若》中的一段话：“他……永不放弃那英雄主义者的雄强自信，他看准了时代的变，知道这变中怎么样可以把自己放在时代前面，他就这样做。他在那不拒新的时代一点上，与在较先一时代中称为我们青年人做了许多事情的梁任公先生很有相近的地方。都是‘吸收新思潮而不伤食’的一个人。”^②即使在历史剧创作中，他也总是设法让历史经由文学加工而成为时代精神的象征，用他自己的话说叫做“献给现实的蟠桃”。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仍不忘将自己与时代的象征紧紧联系在一起，在遗嘱中要求将自己的骨灰洒在大寨的土地上。

①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0页。

② 黄人影编，《郭沫若论》，光华书局1931年版，第8页。



实际上,郭沫若的内心深处,亦并非没有困惑与迟疑。1954年12月8日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扩大联席会议上,他禁不住发出“廉颇老矣”的感叹:“我感觉着我们许多上了年纪的人,脑子实在有问题。我们的大脑皮质,就像一个世界旅行家的手提篋一样,全面都巴满了各个码头上的旅馆商标。这样的人,那真可以说上一塌糊涂,很少有接受新鲜事物的余地了。所以尽管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有五年历史,但总是学不到家。……旧的东西霸占着我们的脑子,不肯让位。……老年人哪里还能容许有什么权威性呢?新陈代谢是绝对必要的,无论在生理机能上,社会机能上。老年人应该为青年人开道,尽量把自己所知道的一些好的东西传授给青年,替他们排除障碍,而不是增加障碍。”^①也许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心态,在风云剧变的“文革”之初,他才会于窘迫之中,说出这样一番话:“在一般的朋友们、同志们看来,我是一个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都说我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什么历史家。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②第二年8月,他在答复一位青年教师对他的批评时,也有过这样的表白:“凤凰每经五百年要自焚一次,从火中再生。这就是我所说的‘烧掉’的意思。”^③但其自贬,与他当时感到压力,希求自保有关,流露出的正是追踪时代而不及的困窘。

①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4页。

② 郭沫若:《向工农兵群众学习,为工农兵群众服务》,《光明日报》1966年4月28日。

③ 黄淳浩编,《郭沫若书信集》(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09页。